



(Photograph by 摄影: Chan, Hin Io 陈显耀)

Crisis and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危机与精神转变

STEPHAN ROTHLIN 罗世范

危机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机遇。疫情的持续和战争的爆发首先表明我们所珍视的一切可能会在片刻之间消失的风险。另一方面，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醒悟并踏上精神之旅的绝佳机会。在所谓的依纳爵年期间，即2021年5月到2022年7月间，耶稣会士和他们的布道团伙伴试图探索依纳爵，这位热爱枪支的巴斯克绅士，是如何变成一位圣徒的？依纳爵的名字与一位早期基督教殉道者——“伊格内修斯”——有关，根据他自己的证词，他渴望被野兽吞噬，渴望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同化。一个自恋的人是如何逐渐变为一位甘愿为拯救世界献身的人呢？

这种转化不仅集中在个人层面，还集中在制度层面：依纳爵热切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并通过他自己内心的这种惊人变化，最终在更大的社会和教会中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改革。

探索精神转化的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方面源于亚洲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德国伦理学家弗里多·里肯将他未发表的手稿寄给我以征求中国学者的回应。里肯认为，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明确提到了康德。根据约翰·罗尔斯（1971）在《正义论》中的观点，“每个人都具有一种源于正义的免于遭受损害的权力，它永远无法以造福整个社会的名义被动摇”。罗尔斯的《正义论》是道德哲学讨论的一个转折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拒绝功利主义和重新与康德传统联系，以及在道德的实质性问题方面远离元伦理讨论。绝对命令的关键概念是一个过程，通过该过程，法律和美德的具体责任在哲学上被重建。绝对命令不是自己构建的；相反，它是对我们日常道德经历的解释。良知有一个基础，而该基础已“反映”在绝对命令的概念中。完美履行互爱 and 互敬的责任产生了人类社会的理想方式：友谊。“友谊（从完美的角度来看）是两个人通过相同的爱和尊重而走到一起”。完美的

友谊可能只是一个想法，但她实际上是一个必要的想法，正如康德所述，努力建立友谊是“理性要求的责任（6：469，17-28）”。

如果友谊是对彼此的美德责任的完美履行，那么它就要求我们为友谊而努力。通过履行责任，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幸福；同时，友谊会促进生活的幸福。根据康德的观点，里肯对完美友谊“只是”一个想法的事实进行了以下解释：如果一个朋友履行了对他朋友的爱的责任，那么他的朋友可能会认为缺乏尊重。“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履行责任可能会向对方暗示他的缺点；然而，这样做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因此是爱的责任。然而，他的朋友可能会认为他缺乏（来自其他人的）尊重。”（6：470，21-24）。但是，“如果某人接受了对方的好处，那么他可能会期待获得平等的爱，而不一定是尊重，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履行责任方面低人一等，这使得他们无法相互沟通”（6：471，6-10）。康德将道德友谊与完美友谊区分开来。道德友谊是“两个人在秘密判断和情感相互透明的情况下完全信任对方，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友谊存在于相互尊重中”（6：471，27-29）。道德友谊完全是相互尊重的问题；而不是参与他人的目标和幸福的问题。一个人渴望向另一个人敞开心扉，同时她又害怕被辜负。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人权伦理学家甘绍平在回应里肯时强调，契约论是康德伦理分析的关键组成部分。甘绍平最感兴趣的是里肯认识到康德与契约伦理之间的联系。在规范伦理学的背景下，以契约为道德论证起点的契约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契约论的伦理学将道德理解为人类为了保护利益和满足需要而做出的理性设计或明智契约。这种契约强调了行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尊重对方的独立意志。契约论将道德视为行为体之间为相互保护利益而进行的合作行为，使社会能够实现最大的正义。然而，将道德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保护利益的契

约也受到了批评和质疑。它倾向于低估利他主义和关爱弱者的道德意义。在经常缺乏责任和义务的互惠且容易陷入任人唯亲和腐败的情况下，坚持契约伦理似乎最为重要。

在分析中西方绘画在艺术层面的丰富互动时，米歇尔·安德森强调了明清时期皇帝与各种传教士在紫禁城内发展起来的友谊，这些传教士与皇帝的家族联系密切，甚至还是他们的导师。正如安德森所观察到的那样，耶稣会士兄弟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无疑成功地描绘了皇帝妃子的形象，她有着类似于圣母玛利亚或被宽恕的罪人的那种空灵之美。观景楼成为她的家，也是她抵达时的祈祷之地。这是一座宏伟的三层建筑，具有优雅的伊斯兰特色。

不知何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种“精神转化”，一种“转变”。先知何西阿这样描述耶和华：“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何西阿书11：8》，《新约及早期基督教希腊文大词典》第24卷）。诚然，正如范圣言（Franz Gassner）观察到的，在《何西阿书11：8》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在寻找某种方法来逃避他在圣约诅咒中所承诺的回应时心中的痛苦。”

雷敦稣（Edmund Ryden）将这一遗产置于在罗马毁灭耶路撒冷（公元70年）之后的犹太教发展概述中讨论，而这一事件决定性地迫使犹太会堂和基督教教堂分离。后圣经犹太教不再与耶路撒冷的圣殿联系在一起，而是海外犹太人的产物，他们

如果友谊是对彼此的美德责任的完美履行，那么它就要求我们为友谊而努力。通过履行责任，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幸福；同时，友谊会促进生活的幸福。

柯兰霓正在撰写的作品报道了澳门利氏学社关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1592-1666）令人神往的生活的研究项目。传教事业的成功确实取决于皇帝的仁慈。柯兰霓认为，汤若望实际上达到了影响力的最高点：作为皇帝的导师——这是在他之前任何其他传教士都没能达到的地位——他不仅对皇帝的臣民和家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通过他的好榜样，他还希望以某种方式影响整个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汤若望凭借他精通的数学、天文学和几何学等自然科学，预想了欧洲的启蒙运动（Aufklärung），在他的思想中，这与福音的预言丝毫不矛盾。

在探索福音的内容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被引导到我们信仰的父亲和母亲面前：以色列人。面对以色列顽固的“不”，先知何西阿让我们见证了上帝在历史上对这一事实的实际回应，以及在他心中神圣洞察的过程。在《何西阿书》中，上帝的心

的身份通过犹太会堂和对《塔木德》中保存的圣言文本的持续研究得到了保障。丹尼斯·麦肯读到的雷敦稣关于《塔木德》的论述特别有效地帮助那些不熟悉它的人理解其在文本中呈现的逻辑以及它们在维护对支持犹太人身份的犹太法律（Halakah）和叙述（Haggadah）的尊重方面的用途。

《塔木德》以两种口传圣传的方式流传，一种是巴比伦人，另一种是巴勒斯坦人，这是对后圣经形势的独特回应，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试图保持对祖先与上帝所立的盟约的忠诚，尽管情况已经彻底改变，大量犹太人流散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并且宗教运动塑造了本质上敌对的文化，即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看一眼《塔木德》的任何一页可能会发现，这一圣经圣传的重点是围绕《托拉》建造一道栅栏，其中心是上帝在西奈山对摩西的启示，这也是上帝与以色列之间为了整个人类缔结的基本盟约。

我在与福岛绫子关于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和马丁·斯科塞斯的同名电影作品的对话中强调了将福音植根于有时充满敌意的文化环境中的戏剧性。与远藤周作的其他小说一样，他的一个主要的见解是每个人都是懦夫。基于他自己的人性局限，福岛解释说，远藤对叛教的传教士和日本基督徒的同情来自他在战时的经历。他写道：“像我一样在战时度过青春的人们都知道，由于社会和政治形势，人们不得不欺骗自己，否认自

待和奴役期间生存并帮助他人。这些女孩被剥夺了殖民特权的地位，成为穷人中最穷的人。她们身无分文，而且总是在守卫的控制之下。她们的身体也不是自己的，因为她们被不断地强奸虐待。女孩们一无所有，也没有未来。然而，正是在这种贫困中，她们找到了友谊。真正的友谊不只发生在王子和哲学家身上：对于穷人中最穷的人来说，友谊仍然可以是一种富裕的体验，也许是她们唯一可以拥有的富裕体验。

罗德里克·奥布莱恩描述了日本军事妓院中一个最动人的友谊故事…女孩们一无所有，也没有未来。然而，正是在这种贫困中，她们找到了友谊。真正的友谊不只发生在王子和哲学家身上：对于穷人中最穷的人来说，友谊仍然可以是一种富裕的体验，也许是她们唯一可以拥有的富裕体验。

己的价值观、梦想和愿望。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踏绘板。”（远藤，2017a, p11）。远藤年轻的时候，他看到日本人被迫崇拜天皇并为之赴死。他们支持并参与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远藤与基督教作斗争，他将其描述为“不合身的衣服”。然而，由于对母亲的爱（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敢放弃自己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和信仰。他在学习和事业上也很挣扎。他年轻时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两次没能考上大学，而他的哥哥则作为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进入东京大学，成为政府的要员。远藤努力成为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基督徒，并认真努力保持忠诚。

罗德里克·奥布莱恩描述了日本军事妓院中一个最动人的友谊故事。每个女孩都为这段关系贡献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对于故事的主人翁扬来说，她的特殊贡献在于带领其他人祈祷的能力。虽然只有扬和另外一个女孩是天主教徒（其他人都是新教徒），但扬对祈祷的熟悉、她对《圣经》的了解以及她领导众人的意愿使她能够在遭受极度虐

与战时剥削的恐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Dacy吴描述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成功合作的实际例子，为中巴之间的传统友谊书写了新的篇章。该案例研究认为，合作虽然艰难，但只要决心，仍然能够实现互惠、相互学习以及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这个引人入胜的案例研究为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员工以及与中国同事一起工作的当地俾路支人提供了如何更好地管理跨文化融合的宝贵经验。中冶集团认真选拔适合海外工作的候选人，为他们提供巴基斯坦和中国文化的背景研讨会以及以技能和安全为重点的培训班，建立旨在增强两国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项目，共同组织节日活动以向员工介绍不同的文化，从而在加深相互了解的过程中巩固项目的可持续性。

澳门利氏学社的另一个研究项目是由Sonja Xia 承担的，她选择了尼撒的圣贵格利来帮助了解精神转化的过程。贵格利将精神转化定义为一种用否定方法获得的觉醒，即一个人在面对上帝的卓越和不可理解

时意识到人类的智力能力是有限的。尼撒的贵格利在他对亚伯拉罕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的解释中清楚解释了这一点。像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教父一样，贵格利使用寓言的方法来阅读圣经。对于贵格利来说，知识并没有让亚伯拉罕理解上帝，而是让他意识到上帝超越了人们所知道的一切。

最后，郭春庆对人类灵魂的微妙转变进行了最鼓舞人心的探索，他让我们接触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作品，后者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不同学院中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似乎是一种极其微不足道的生活。

“年复一年，世界了无风雨”与著名的耶稣会兄弟圣亚方沙·罗德利（St. Alphonsus Rodriguez）的描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妻子去世后加入了耶稣会。几十年来，马略卡岛的阿方索的卑微使命就是看门人。这位普通的耶稣会兄弟只是“看门”并获得圣洁的例子让霍普金斯想起一位牧师说过：“对于最圣洁的人来说，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在于良好地履行普通职责。”

在明显的“日常废话”中发现通往深刻圣洁的特权途径似乎是一个最不寻常的最终结论。然而，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和肖努在他们创新的历史研究中不断提醒我们的那样，似乎确实是通过日常事件，我们才开始真正了解中世纪历史以外的历史进程。沿着相同的思路，我们发现个人和制度层面的决定性微妙和渐进式转变可能使我们有机会把当前的危机作为与亚伯拉罕一起踏上信仰之旅的独特圣召。看似微不足道的道路正在转变为邂逅真理的决定性方法。



罗世范，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